

Milan Kundera

米兰·昆德拉
捷克

玩笑

米兰·昆德拉小说系列

安娜娜 译



米兰·昆德拉小说系列

玩 笑

●〔捷〕米兰·昆德拉/著
● 安丽娜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达龙

玩 笑

米兰·昆德拉/著

出版: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兆成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194千

版次:1998年9月第1版

印次: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ISBN 7-225-01539-7/I·355

定价:15.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前 言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米兰·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一九八五年五月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本文为昆德拉在典礼中讲词摘录。

以色列将其最重要的奖项保留给世界文学，绝非偶然，而是传统使然。那些伟大的犹太先人，长期流亡国外，他们所着眼的欧洲也因而是超越国界的。对他们而言，“欧洲”的意义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文化。尽管欧洲的凶蛮暴行曾叫犹太人伤心绝望，但是他们对欧洲文化的信念始终如一。所以我说，以色列这块个小的土地，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园，才是欧洲真正的心脏，这是个奇异的心脏，长在体外之外。

今天我来领这个以耶路撒冷命名，以伟大的犹太精神为依归的奖项，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激动。我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来领奖的。不是“作家”，法国文豪福楼拜曾经说过，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后面消失。他不能当公众人物。然而，在我们这个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时

代，往往相反，作品消失在小说家的形象背后了。固然，今天无人能够彻底避免曝光，福楼拜的警告仍不啻是适时的警告：如果一个小说家想成为公众人物，受害的终归是他的作品。这些小说，人们充其量只能当是他的行动、宣言、政见的附庸。

小说家不是代言人。严格说来，他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当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时，他心目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她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应得。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这当中并非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我姑且称之为“小说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因此，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

可是，这“小说的智慧”究竟从何而来？所谓“小说”又是怎么回事？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我常想象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嘎嘎坠地了。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应。

为什么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呢？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当人们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唐·吉珂德左思右想，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右想。他们不但未曾看透世界，连自身都无法看清。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艺术，那就是小说艺术。

十六世纪法国修士、医师兼小说家拉伯雷替法语创造了不少新词汇，一直沿用至今。可惜有一字被人们遗忘了。这就是源出希腊文的 Agelaste，意指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拉伯雷对这些人既厌恶又惧怕。他们的迫害，几乎使他放弃写作。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

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因为他们从未听过上帝的笑声，自认掌握绝对真理，根正苗壮，又认为人人都得“统一思想”。然而，“个人”之所以有别于“人人”，正因为他窥破了“绝对真理”和“千人一面”的神话。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在过去四百年间，西欧个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以小说艺术为先导。

巴汝奇是欧洲第一位伟大小说的主人翁。他是拉伯雷《巨人传》的主角。在这部小说的第三卷里，巴汝奇最大的困扰是：到底要不要结婚？他四出云游，遍寻良医、预言家、教授、诗人、哲人，这些专家们又引用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可惜尽管穷经皓首，到头来巴汝奇还是决定不了应否结婚。我们这些读者也卜不了结论。当然到最后，我们已经从所有不同的角度，衡量过主人翁这个既滑稽又严肃的处境了。

拉伯雷这一番旁征博引，与笛卡儿式的论证虽然同样伟大，性质却不尽相同。小说的智慧跟哲学的智慧截然不同。小说的母亲不是穷理尽性，而是幽默。

欧洲历史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它对于小说艺术的精神，其所揭示的新知识，及其独立发展的传统，一无所知。小说艺术其实正代表了欧洲的艺术精神。这门受上帝笑声启发而诞生的艺术，并不负有宣传、推理的使命，恰恰相反。它家境内洛碧(Penelope)那样，每晚都把神学家、哲学家精心编织的花毯拆骨扬线。

近年来，指责十八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及理性万能的信念。”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十八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的，它也属于（甚至可能是全部）费尔丁、斯梯芬，歌德和勒卢的。”

十八世纪的小说之中,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项迪传》。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描述主人翁开始在团体里骚动那一夜,走笔之际,斯特恩突发灵感,使他联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随后上百页篇幅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象是在耍花枪。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决不仅仅在于耍花枪。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

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

因此,也许可以说,小说跟哲学有过间接但重要的对话,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基于莱布尼兹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

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的理念,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他们认为,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人要生存得有价值,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所有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成功与失败。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急剧地奔向死亡的终点。

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锁反应的方程式。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而是从行为的终点着手。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他优哉游哉地云游寻找。看斯特恩的小说,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毫无道理可言。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

评价一个时代精神不能光从思想和理论概念着手,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艺术,特别是小说艺术。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时,黑格尔坚信他已经掌握了世界历史的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在谈论人类的愚昧。我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思想界最伟大的创见。

当然,早在福楼拜之前,人们就知道愚昧。但是由于知识贫乏和教

育不足,这里是有差别的。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愚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可怕的爱玛,无论是热恋还是死亡,都跟愚昧结了解之缘。爱玛死后,都要跟布尔尼贤的对话真是愚不可及,好象那场丧礼上的演说。最使人惊讶的是福楼拜他自己对愚昧的看法。他认为科技昌明、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愚昧反而跟随社会进步一起成长!

福楼拜着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语,一般人常用来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流。他把这些流行用语编成一本辞典。我们可以从这本辞典里领悟到:“现代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福楼拜的独到之见对未来世界的影响,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要深远。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但是不能没有抗拒各种泛滥思潮的能力。这些洪水般的思潮输入电脑,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这股势力足以窒息欧洲文明。

在福楼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维也纳人布洛克(Hermann Broch)写下了这么句至理名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抗争,最终被淹没了。”

Kitsch 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既然想要讨好,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既定的模式思潮之中。Kitsch 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

今天,时光又流逝了五十年,布洛克的名言日见其辉。为了讨好大众,引人注目,大众传播的“美学”必然要跟 Kitsch 同流。在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下,我们的美感和道德观慢慢也 Kitsch 起来了。现代主义在近代的含义是不墨守成规,反对既定思维模式,决不媚俗取宠。今

白之现代主义(通俗的用法称为“新潮”)已经融会于大众传媒的洪流之中。所谓“新潮”就得竭力地赶时髦,比任何人更卖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现代主义套上了媚俗的外衣,这件外衣就叫 Kitsch。

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不但墨守陈规,而且媚俗取宠,他们是艺术的大敌。正如我强调过的,这种艺术是上帝笑声的回响。在这个艺术领域里,没有人掌握绝对真理,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这个自由想象的王国是跟现代欧洲文明一起诞生的。当然,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欧洲”,或者说是我们梦想中的欧洲。我们常常背叛这个梦想,可也正是靠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股凝聚力已经超越欧洲地域的界限。我们都知道,这个宽宏的领域(无论是小说的想象,还是欧洲的实体)是极其脆弱的,极易夭折的。那些既不会笑又毫无幽默感的家伙老是虎视眈眈盯着我们。

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城市里,我一再重申小说艺术。我想,诸位大概已经明白我的苦心,我并不是故意回避谈论大家都认为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欧洲文明内外交困。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考、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对我来说,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我想把这篇答谢辞归功于小说的智慧。我不应再饶舌了。我似乎忘记了,上帝看见我在这儿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讲,他正在一边发笑。

目 录

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前言).....	1
1. 卢德维克	1
2. 海伦娜	11
3. 卢德维克	23
4. 雅罗斯拉夫.....	121
5. 卢德维克.....	163
6. 科斯特卡.....	209
7. 卢德维克 雅罗斯拉夫 海伦娜.....	241

72

卢德维克

哦,到了,多年以后我又重返故里。站在广场上(在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我曾无数次打这里走过),我没有感到任何激动;我只是觉得,这块平地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阅兵场,高耸在众多屋顶上的市政厅尖顶,就像是一个戴着古代头盔的士兵;这个摩拉维亚城市曾经是抵御马扎尔人和土耳其入侵者的堡垒,往昔的战争在它的外表上刻下了一系列不可磨灭的丑陋的痕迹。

多年来已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吸引我的了;我对自己说,对这个地方我没有留下任何感情;这似乎十分自然:我离开这儿已有十五年,我的朋友或熟人几乎都已离去(包括那些我想避开的人),我母亲葬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一个我从未光顾过的坟墓里。可是我一直都在欺骗自己:我以为这是冷漠,事实上却是嫌恶;我没有看出这种心理,因为同在别处一样,在这儿我既有愉快的经历,也有不愉快的经历,但仅此而已;正是这次旅行使我意识到:把我带到这儿来的使命在布拉格也可以轻易完成,如果在这里,在我的家乡,我才突然觉得不可遏

制地看清了这一点,那是因为整个念头是如此玩世不恭、卑鄙无耻,以至于我是出自对往事伤感的依恋而回到这里的任何怀疑都受到了嘲弄。

我最后讥讽地看了一眼不雅观的广场,转身背朝着它,动身去我在那儿订了一个房间过夜的旅馆。看门人从木牌上取下一把钥匙递给我,说:“二楼。”房间实在不怎么样:靠墙有一张床,中间是一张小桌和椅子,床边是一个外观华丽、带有镜子的桃花心木衣柜,门旁有一个破旧的小脸盆。我把皮包放在桌上,打开窗户;窗户面朝着一个庭院和比邻楼房光秃肮脏的背面。我关上窗子,拉下窗帘,走到脸盆前,那儿有两个龙头——一个蓝色,一个红色;我拧开它们,冷水从两个龙头里流出来。我打量了一眼桌子,还不算太差;至少可以放一个水瓶,两只杯子;问题是只能坐一个人;只有一把椅子。我把桌子推到床边,试着坐下来。可是床太低,桌子太高;此外,床在我的重量下陷得那样低,以至于我顿时就意识到,它不但作为一个座位不能令人满意,而且作为一张床也不能起到它的作用。我用拳头撑住床,然后躺下去。小心翼翼地抬着腿,以免弄脏毯子。床凹得很厉害,我简直觉得我是躺在吊床里。真不能想象什么能和我共享这张床。

我在椅子上坐下来,瞪视着半透明的窗帘,开始想心事。这当儿,从过道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两个人,一男一女,正在谈话。我能听懂他们的每一句话:一个叫彼得的男孩从家里逃走了,他的婢娘克拉娜是一个傻瓜,惯坏了这孩子。接着一把钥匙在锁眼里转动,门开了,谈话声仍在隔壁房间继续;我听见那女人在叹气(是的,甚至她的叹气也能听见!),那个

男人决定给克拉那一个最后的忠告。

等我站起来时,主意已定;我在脸盆里洗了手,用毛巾擦干,然后离开了旅馆,虽然我并不清楚到哪儿去。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我不想破坏这次旅行(漫长而艰辛的旅行)的成功,除了得到一个本地熟人周密的帮助,我没有别的选择,尽管我很讨厌这个想法。我头脑里掠过从青年时代起所有的熟面孔,把他们一一都否决了,只要由于所提供的帮助的机密性质需要我越过这道鸿沟,说明我为何多年在外——一种我不愿做的事。但是,接着我想起了一个人,一个新来的人,这个人我曾帮他找过工作,要是我果真了解他,他会非常高兴以德报德的。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物,既审慎地严奉道德,又古怪地浮躁不安,反复无常,就我所知,几年前他的妻子跟他离了婚,因为他从来不同她和儿子在一起生活。我有点紧张:如果他再婚了,这将使事情变得相当复杂。我尽可能快地朝医院的方向走去。

当地医院是一个由楼房和分隔部组成的综合建筑群,散布在一大片绿化地区;我走进大门旁边的传达室,要门卫为我接通病毒室,他把电话往工作台边沿一推,说:“02。”我拨了02,结果得知科斯特卡医生刚刚离开,到外面去了。我在大门附近一张板凳上坐下来,以便不会错过他,一边瞧着穿着蓝白条纹的医院长袍在各处闲荡的人们。然后我看见了他:他沉思着走来,又高又瘦,引人注目地没有吸引力。是的,正是科斯特卡,没错。我站起身,照直迎向前去,仿佛有意要碰撞他;起初,他恼怒地看了我一眼,但是接着他就认出了我,随即张开了臂膀。我觉得他的惊喜超过了他的愕然,他那毫不故作

的欢迎很给人鼓舞。

我解释说我刚来不到一小时,为了一些不必要的事要在这儿耽搁两三天;他立刻对我说,我首先想到来看他,他是多么惊讶和感激。突然,我感到自己别有用心,并且出于算计而又不是真正的兴趣提出我的问题(我快活地问道:“怎样?又结婚了吗?”)是很不对头的。他告诉我(这使我宽慰)他仍是单身一人。我提出我们有许多话要谈。他表示同意,但抱歉地说他只有一个多钟头的时间,然后他得回医院当班,夜里又离开城镇。“你是说你不住在这里?”我失望地问。他让我放心,他住在城里,他在新村有一个单身房间,但是,“独身生活是没有益处的”。原来科斯特卡有一个未婚妻,住在十五哩外的另一个城镇,他是一个教师,有一套两个房间的寓所。“那么,你最后将跟她搬在一处?”我问。他说他未必能在那儿找到一个好工作,像我曾帮他找过的一样有趣,而他的未婚妻要在这儿找到一个工作也很麻烦。我开始(十分真挚地)咒骂官僚主义的失职,不能将夫妇安排住在一起。“冷静点,卢德维克。”他带着温和的宽容说,“像这样也并不太坏。来回旅行当然得花时间和费用,可是我却保持了 my 独处不受影响——还有我的自由。”“你的自由对你干嘛就那么重要?”我问他。“那么你的自由对你干嘛就那么重要。”他反问道。“我喜欢和女人交往。”我回答。“我需要自由不是为了女人。”他说,“我是为了我自己。喏,到我的住处去,直到我离开,怎么样?”这真是再好不过了。

离开医院院区不久,我们来到一处建筑物前,楼房鳞次栉比地矗立在一块凹凸不平、满是尘土的场地上(没有草坪,小径

或道路),在城市和远处的原野之间形成一道可怜兮兮的屏障。我们走进一道门,爬上狭窄的楼梯(电梯出了故障),到了三楼,在那儿我看见了科斯特卡的名牌。当我们从门道走进主房间时,我愉快地看到角落里有一张宽大舒适的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安乐椅,琳琅满目的书籍,一架唱机和一台收音机。

我赞扬了这布置,并问起浴室。“一点也不奢华。”科斯特卡说,对我的兴趣感到高兴。他引我回到门道,打开一扇门。这是一间小而舒适的浴室,浴缸、淋浴和脸盆样样俱备。“看到你这个好地方,使我有了一个想法,”我说,“你明天下午和晚上做什么?”“很不巧,明天我要工作到很迟。”他歉意地回答,“我要到七点钟左右才回来。你晚上有空吗?”“也许有,”我回答,“不过你能把这个住处借给我一个下午吗?”

我的要求使他感到诧异,但他立刻(好像担心我会认为他不乐意)回答说,“我很高兴让你享用它。”接着,他审慎地试图避免猜测我的用意,加了一句,“如果你今晚需要一个地方睡觉,尽管留在这儿好了。我要到早晨才回来。不,甚至那时也不会回来。我会直接去医院。”“不,没有必要。我在旅馆有一个房间。问题是,旅馆房间不是很舒适,而明天下午我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当然。”科斯特卡说,垂下眼睛。“我也这样想。”我顿了一下,然后补充说,“我很高兴能够帮你忙。”又顿了一下,“提供它的确是一桩好事。”

然后我们在桌边坐下(科斯特卡倒了咖啡),聊了一阵(我试了试床,满意地发现它很结实,既不凹陷,也不吱嘎作响)。

不久,科斯特卡说他该回医院去了,他很快教给我主要的家务事项:浴缸的龙头需要格外拧紧,与通常采用的程序相反,热水只有从标着C符号的龙头才能得到,收音机的插座藏在床下,食橱里有一瓶新开的伏特加。他给了我两把串在一起的钥匙,告诉我哪一把开楼房的大门,哪一把开他的寓所。在屡屡换床的一生中,我已养成一种对钥匙的个人迷信,于是我窃喜地把科斯特卡的钥匙揣进我的口袋。

在我们往外走时,科斯特卡表示希望他的寓所会有助于“一些真正美好的事”。“是的。”我说,“它会帮助我做一桩美好的毁灭工作。”“那么你认为毁灭会是美好的。”科斯特卡说。我暗自笑了,在他的反应中(不动声色地表达一个异议),认出了我十五余年前初次遇见的那个科斯特卡。虽然我喜欢他,但我也发现他有点可笑,于是我回答说:“我知道在上帝永恒的建筑工地上,你是一个温和的工作者,不喜欢听到有关破坏工作的事,但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恰恰不是一个上帝的泥瓦匠。喏,如果上帝的泥瓦匠修筑了真正的墙,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毁坏它们。但是我所看到的却不是墙,而是幕布,是布景。而布景是肯定能毁坏的。”

这番话把我们带回到(大约九年前)我们分手的地方。然而,这一次,我们的争论却带有一种明显抽象的性质:我们都十分清楚它的具体的基本点,觉得用不着重申它们。我们只需注意我们改变得是多么少,我们彼此保留的不同是多么相似(尽管我必须说,正是我们的区别使我喜欢他,喜欢我们的争论;我把它作为一个检验我是谁,我在想什么的试金石)。但是为了明确阐明他的立场,他回答说:“就算你说得对,但是

告诉我，一个像你这样的怀疑主义者怎么能如此肯定，你知道怎样区分一个布景和一堵墙？你难道没有怀疑过你所嘲笑的是幻觉是幻觉吗？如果你错了怎么办？”如果你如此起劲要毁坏的是真正的价值又怎么办？”他接着又说：“一个贬低的价值和一个没有标记的幻觉有着相同的可怜的外表。它们是同一的。没有比把其中一个当作是另一个更容易的了。”

我陪着科斯特卡穿过城镇回到医院去，在口袋里玩弄着钥匙，想到同一个随时随地，甚至此时此刻在穿过一个新村凹凸不平的路面时，愿意跟我开诚相见的老朋友一道回去是多么愉快。由于科斯特卡知道明天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待一晚上，他把奥妙的哲理探讨转到更现实的事情上：他想弄清楚我是否会一直等到他明日七点回来（他没有别的钥匙），并问我是否真的没有别的事需要他帮忙。他用手摸着脸说：“只是要去一次理发店。”因为感到胡子拉碴的不爽快，“把这事交给我。”科斯特卡说：“我要让你得到第一流的修面。”

我接受了科斯特卡的好意，让他把我带到一个小理发店，里面有三把大转椅耸立在三面镜子前。两把椅子占着人，头朝后仰着，脸上满是肥皂；两个穿白罩衣的女人俯身在他们上面。科斯特卡走到一个女人身边，附耳低语了几句，那女人在一块布上擦擦剃刀，对店后面叫了几声，又出来一个穿白罩衣的姑娘。新来的姑娘接过被丢开手的男人，那个与科斯特卡说话的女人朝我点点头，示意我坐到空着的椅子上。科斯特卡跟我握握手，他一走我就在椅子上坐下，把头朝后靠在头枕上。由于多年的经历教会我不要瞧自己的脸，我避开直对着我的镜子，抬起眼睛，让视线游离在污浊斑驳的白色天花板